

双城十年两岸缘

曹景行

《双城记》这个节目的播出时段一直蛮差的，早几年安排在半夜某个明星脱口秀后面，这两年则是每星期六早上八时十分首播，跟在《东方卫视》早新闻之后。常常有朋友说周末睡过头错过时间，我都会提醒他们可看回放，当然麻烦许多。但我们也有自知之明，很清楚这种时政类谈话节目收视率 and 广告收益远远比不上郭德纲们和真人秀，所以也一直安安心心呆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看着同类节目一个个消失，暗中庆幸自己尚无生死之虞。

但我们也有把郭德纲比下去的底气。毕竟我们开播比他们早得多，而且我大胆预言两三年后我们的节目仍会继续下去，他们呢？再有我们节目的覆盖面很大，在东方卫视、东方卫视海外频道、中天亚洲台、中国电视新闻台等九个频道同步播出。前几年我去太平洋当中的关岛过年，打开酒店电视突然见到自己的大头特写，着实吓了一跳。

确实，大陆和台湾这么多电视台，能够两岸共同制作、同步播出的节目，大概就我们《双城记》一个，而且还是时政类的，想想挺不容易、也蛮牛的。2013年度的“中国电视榜”特别给了我们一个“最具地域交流性电视节目”奖项，同时还提名“最佳人文节目”；获奖评语说《双城记》“以多元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让新闻当事人跨越地域局限，真正实现了两岸三地的无缝对接——在跨越海峡的思想交锋中，我们读懂了中国。”2016年度，《双城记》又入选为“中国电视满意度”榜的“卫星频道新闻类栏目十强”。

《双城记》能存在到今天，还能得奖上榜，远超出最初节目策划时的预见。十年前的2008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参与了上海东方卫视的一系列专题节目，年尾告一段落，主管新闻的陶秋石同我聊起还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兴趣都在两岸关系和台湾新闻上。那一年两岸关系出现突破性进展，民间交往越来越密切，更需要增加相互了解。

东方卫视与台湾中天电视已有合作关系，此时共同制作一个涉及两岸热点新闻的谈话节目，可说是因缘际会，于是就有了《双城记》。

还有另外一层特殊关系，因为我也曾是“中天人”，在香港当过半年“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没多久“中天”被台湾辜振甫家族吞购，后来又几经转手；我虽早就离开，却与台湾的几位“老中天”一直有联系，去台湾时还会被他们半开玩笑称作“老长官”。

作为一个两岸电视人共同制作的节目，《双城记》从一开始就合作得很好，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如今进入第十个年头。幕前幕后人员虽有一些变动，如中天的主持人由卢秀芳替换了平秀琳，上海方面王津元离开后主持人由雷小雪和李茜轮替，两岸制作团队却越来越像是一家人。卢秀芳早已成为所有成员口中的“秀芳姐”，就连我有时也会脱口而出。每星期录节目时，卫星信号把我们连接起来，平时则通过电脑和手机。尤其这两年微信大行其道，两岸间几乎随时都可以讲上几句。

除了我“曹老师”和卢秀芳，其他成员多为八零后或者九零后的“小朋友”，只是台北中天的全是女生，上海东方卫视多为男生。久而久之，上海的那几位都成为新一代的台湾通，甚至比好些台湾人还熟悉台北。有时候，中天那边的女孩要去台北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居然会先询问上海如制片人安乐的意见，得到的信息往往更加精准。

我们这些年在节目中介绍了好多位以上海为家的台商和青年创业者。去年三月《双城记》为纪念开播八周年，上海录影棚里特别请来了嘉宾海丽，她原来是我们制作团队中天方面的成员，因节目而了解上海、移居上海。有趣的是，那期节目结束时我们都打出“八”的手势合影，一只手竖起拇指加食指，那是大陆的“八”，另一只手却多了一根中指，那是台湾的表示方式，或许正是《双城记》“求

同存异”的最贴切表示。

我们节目的样式主要在各自的摄影棚里隔空对话，由于卫星联线的技术原因，声音传到对方耳朵里总会有两三秒钟的延迟，弄不好就会抢话“打架”；或者两边都停下来让对方先讲，接着又同时说话，马上又都尴尬地停下。时间久了，彼此间有了默契，大概到什么时候就会把说话机会“抛”给对方；有时我要插进去讲什么问什么，只要简短一声“秀芳”，她马上就会“制造”给我说话的空隙。我们使用录影棚和卫星联线的时间都有限制，好在双方都有效率，协调配合，每次只要一个小时左右就可完成录制。再经细致的后期制作，每星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最新那集，一定既紧凑又顺畅。只是好些观众看完会说“意犹未尽”，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实际上，节目时长四十五分钟已经短了。

年复一年，《双城记》的形式也多样化起来，《两岸青年论坛》就是每年的重头戏。2014年9月的论坛请来了两岸知名人士陈文茜和潘石屹对话，并同在场的几百名两岸大学生对话，很是精彩。但那天晚上主持论坛的我，却被北外滩会场对面灯火全开的陆家嘴夜景迷住了，甚至有点震撼、有点分心。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都没料到那天晚上的景色会那么美，何况对台湾来客。记得1998年10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到访上海，我同台湾媒体朋友完成采访报道走出外滩和饭店，来到黄浦江边享受半夜的拂面秋风。一位台湾女记者看着对面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问我“用了多少时间”，我说“大概五年”。她同其他台湾记者都默然了。十多年过去了，又是秋风拂面的晚上，又是从外滩眺望黄浦江对岸……

我们也把两岸青年论坛的会场放在对岸的大学校园里，前年请去了姚明的嘉宾是北京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叶君与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周功鑫。挤满会场的

除了台湾本地的大学生，也有不少在台湾就学的“陆生”。今年请谁做嘉宾呢？前些日子讨论时，我想到了上海仁济医院的夏强医生和台湾高雄长庚医院名誉院长、著名肝脏移植专家陈肇隆。他们去年四月就上过我们的节目，介绍两岸肝脏移植技术的交流。在陈院长的帮助下，上海仁济医院已经建立起大陆数一数二的肝脏移植医疗团队，去年手术量超过八百例，创造了全世界单中心全年肝脏移植手术的最高纪录。希望下个月将在高雄举行的两岸青年论坛能够告诉在场学生和电视前的观众，两岸关系虽然起伏，但民间交流仍然可以扎扎实实往前推进，我们《双城记》节目也一定会与此同步。

两岸间的彼此吸引，往往也在吃喝玩乐方面。就像那年陈文茜来上海参加我们的论坛，整个白天就待在和平饭店往前走一步，关在房间里专心对付朋友送来的一堆大闸蟹，“九雌十雄”正当令呢！在我们每年的两岸直播游台湾、游上海、游澳门的特别节目中，美食起码占有内容的一半。我虽然算是老上海，但毕竟离开了二三十年，如今多亏带着卢秀芳游上海，才有机会去了不少没去过的地方，品尝了不少好久没吃过的美食，等于重新认识了新上海。在台湾，我们更想全岛玩透透，今年就先去澎湖又去花莲，拍下了许多精彩镜头，包括我在花莲七星潭海滩欣赏蓝天白云时，被突如其来的大浪差点卷进太平洋。

再过两天又要拍摄“两岸直播游上海”了，会不会向秀芳介绍上海的旗袍呢？记得1993年深秋我第一次到台北采访，电影“金马奖”颁发的第二天，台湾电影界数百名明星会聚来饭店，女士一色旗袍，派对名称就叫“夜上海”。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进口博览会的准备情况，那是上海的大事，也应该会引起台商和台湾媒体朋友的关注。其实不用我多想，我们的上海团队早已开始策划，一定会给台湾老朋友许多意外惊喜。

在举办了2014年世界杯决赛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之后，巴西故都里约热内卢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在我眼里，原本她就是南半球甚或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2018年8月，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也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四位四十岁以下的数学家获得目前数学的最高奖——菲尔兹奖，其中伊朗库尔德裔的数学家、剑桥大学Birkar教授的奖章失而复得，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眼光。

巧合的是，2000年8月，我也曾应邀赴里约热内卢参加首届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区数学家大会。那时我在哥伦比亚访问，组委会慷慨解囊，为我提供了往返机票和半个月的生活费用，我因此在著名的科帕卡巴纳街区海滩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同样巧合的是，这两次数学家大会的举办地均为印巴（IMPA，巴西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这让我回忆起十八年前的美好时光。

虽说八月初是南半球的隆冬时节，里约热内卢的天气仍然像我们的初夏一样美好。瓜纳巴拉机场的名字听起来像一种热带水果，在飞机盘旋着下降的时候，我俯身从窗户里看见了海湾，蓝色浩淼的水波见不到尽头，可以想象它的深度。难怪五百年前意大利航海家韦斯普奇率先来到此地时，误以为是一条大河的出口，因此命名为Rio de Janeiro，意思是一月的河，巴西人称之为Rio，即里约。

抵达里约，果然是名不虚传，里约拥有天下最美的海滩，金黄的沙滩，雪白的浪花，和煦的阳光，醉人的暖风，到处可见五彩缤纷的阳伞和游客。里约的沙滩绵延一百多公里，尤以科帕卡巴纳最富盛名……

印巴坐落在里约植物园后头的山坡上，景色宜人，从图书馆的阅览室可以眺望大西洋，这在地理上与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数学研究所颇为相似，加上它的学术水平，故而素有“南半球的伯克利”之誉，难怪“首届拉美数学家大会”选择在此举行。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位代表云集在此，使得印巴热闹非凡。

说到印巴，不能不提美国数学家斯蒂芬·斯梅尔，他是一位爱好旅行、帆船、矿石和正义的传奇人物。1960年初，他偕夫人和两个孩子来到里约，在印巴做为期半年的博士后研究，住在科帕卡巴纳海滩附近的一个豪华公寓里，据说有十一个房间。正是在里约期间，斯梅尔证明了高维的庞加莱猜想，即当n大于4时，与n维球具有相同伦型的紧致n维流形必同胚于n维球。

有一则趣闻，1966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斯梅尔获得了菲尔兹奖。颁奖前他偕家人在希腊度假，驱车从前南斯拉夫进入希腊，当他在开幕前搭乘每天唯一的航班从雅典飞往莫斯科时，海关官员拦住了他，因他的护照印戳显示带车入境，而他又一时找不到家人。后来他终于联系上美国大使馆做担保，才搭乘一架布达佩斯的航班转道莫斯科，并在颁奖仪式开始时到场。

出人意料的是，我在印巴竟然遇到四位昔日大学同学，他们在南美三个不同的国度执政。比中国人更多的是俄国人，自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发起救助俄国同行运动，趁机招揽人才。南美尤其是巴西也接纳了会议休期间的通用语言。其时佩雷尔曼尚未在互联网上宣布证明原汁原味的庞加莱猜想，那以后俄国人人才更为吃香。

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为何希尔伯特的23个数学问题里没有庞加莱猜想，原因如下：希尔伯特是在1900年巴黎数学家大会上提出23个问题的，那次大会的主席正是法国人庞加莱。也是在那年，庞加莱宣布证明了自己的猜想，故而没有被希尔伯特收入。四年以后，他用一个反例说明自己的证明有误，从那以后才逐渐成为举世

蔡天新

闻名的猜想。

一天下午，我从印巴山上坐公车下来，一路与同行者聊得起劲，下车时居然把背包遗忘在座位上。包内除了数学资料、地图和雷亚尔以外，还有一台傻瓜相机（即将拍完的胶卷记录了麦德林诗歌节）和一本红色的“拉丁日记”。当我搭乘下一班火车赶到终点站，已经不见那辆车和司机的踪迹，尽管后来我请人用葡萄牙语写了两张寻物启事，分别贴在那路公车的起点和终点，却没有任何反馈。

当我老同学听说此事后，都笑我此举纯属多余，巴西人不会把捡到的东西交还给失主。本文开头提到的库尔德数学家丢失的菲尔兹奖章，自然也找不回的，亏得组委会给他补发了一枚。经过他们的提醒，我才发现，里约的乘客无论男女老幼均把背包或手提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旅途中丢失重要物品，尤其是胶片和笔记本令人心痛，从那以后，我便不再写日记了。

2014年首尔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里约出生的巴西青年阿尔·阿维拉获得了菲尔兹奖，他毕业于里约联邦大学，后来在印巴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动力系统和谐理论。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阿维拉的获奖，才使国际数学家联盟最终确定由巴西承办这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但这一定是个有利因素。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除了赫赫有名的菲尔兹奖以外，还颁发四个奖项，分别是高斯奖、陈省身奖、莉拉瓦蒂奖和纳瓦林纳奖。其中莉拉瓦蒂奖（奖金比菲尔兹奖略高）是专门颁发给数学普及和数学传播方面的。获奖的是土耳其数学家阿里·辛奈，他创建了数学村庄，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数学教育、研究和发现的场所。

来后，人累得都要虚脱了。

在山里到底能走出多远？不可知，上了这山又见那山。有一次，我们走进山里三十米处，看到一户人家，住在用一片片青石板搭成的小屋里，门前有一口浅浅的山泉井。一问，房主是河南人，听口气好像是1960年代初来的。他们没有参加当地的公社生产队，不属于哪个村子的人，没有当地户口。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土豆、瓜果，此处海拔较高，无霜期很短，山下的农作物在他们这里不能生长，只能在树林边上、坡地上种些土豆。他们的土豆非常好吃，蒸熟，就开花，吃起来又沙又面，不像山下的那么湿。我们问，一年四季只吃土豆怎么能行？他们说，也背些土豆到山下换玉米面、小米，但已经是很稀罕珍贵了。吃的盐、醋，也是拿土豆换来的，还采一些山珍草药去卖。

1970年代中期，我们知青陆续离开了这个小山村。至于村里什么时候烧煤了，什么时候用电了，什么时候用上液化气，什么时候不进山砍柴了，我没有细问。但我知道，近二十年来，不再靠砍柴做饭取暖，山里的灌木已经茂密成林，它们在滋养水土。夏季的暴雨降临，山林的植被自然地吸纳着雨水，于是，不再有山洪，不再有滚动的石头，村里的泄洪沟也就萎缩了。

砍柴和捞柴永远地从生活中消失了。这是自然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吧？

迷人的里约与菲尔兹奖

老歌

周实

朋友说：你听音乐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听着听着就分不清那音乐是在你的体内还是在你的身外了。

我说这是好音乐，不好的音乐可不是。好的音乐能让你感到一个眩晕的漩涡在你体内慢慢升起，似乎想要融入你的身体深处的黑暗中。你想要抓住却又空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内外的眩晕合而为一，它们互相涌向对方，自然交融，不分彼此，差别消弭为一种纯粹，没有间隙，没了声响，这个相逢让万物归一。

他说我描绘得很好。我说是书上看到的。

他说借给他看一看。我说没问题。他还说：我的小学和中学，音乐老师都很好。我还记得小学的那位男音乐老师，三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头发好长，不修边幅。他给我们教的歌曲都是他自己挑选的，与别的小学教的不同。记得有一首《行军小唱》，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
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
叮叮得儿龙格龙，
叮叮得儿龙格龙，
哼（鼻音）……
炮口在笑，战马在叫，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
我们走过村庄，我们渡过大河，
炮手啊扶着炮，射手啊拉着骡，
歌粮的毛驴儿摇着它的长耳朵。
叮叮得儿龙格龙，
叮叮得儿龙格龙，
哼（鼻音）……
他那深沉的男中音唱起来格外有韵味，他还让我们分声部唱，自己眯起眼睛听，很陶醉。那时候好歌太少了。还有一首很欢快的，只记得后面几句了：

提上你的木桶，老牛身上挤奶，
拿着你的皮鞭，赶着羊儿回来。
啊！白羊奶子拌炒面，太阳底下多么自在。
说着，他就哼了起来，哼得那么有腔有调。
几十年了，还记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笔会

旅行者

（布面综合）

玛利亚·尤金妮亚·阿克勒 [智利]

难忘那个小山村

邢小群

回家晒干，非常好烧。我曾看到一篇小说，讲的就是捞柴的故事，那情景和我在村里见到的一样。而平时，村中央这条泄洪沟却是干的，沟两边的人家来来往往地走着，如履平地。

我在村里排队的时候，农民买不起煤炭，家家做饭取暖都是烧柴。柴火的来源，靠从山里砍伐。我所在的村子，地处霍山山脉的半山上，正好是出入深山的起点处。入乡随俗，那几年秋天，我们也参加了上山砍柴——

收了秋，第一场雪来临前，是村里人砍柴的时间，断断续续大约有两个月。老乡们是当年烧头两年的柴，而将当年砍来的柴码放在院子周围，风吹雨淋日晒晒，越干得通透越好烧，越节省。因此，看一家人会不会过日子，进门先看柴火垛。家境越殷实，柴火垛越高、越厚实。知青没有任何家底，自然也没有隔年的柴，砍来的湿柴，当年就烧。本来柴就少，又湿，在烧柴方面总是捉襟见肘。

每到深秋，清晨，一觉醒来，找出既耐磨又比较破旧的衣服穿上，急忙吃了早饭，带上一顿干粮，柴刀上勾着一条粗绳，脚踏球鞋，就随老乡一起上山了。房东大哥成了我们的师傅，相随的还有和我们一起混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最愿意指指点点教我们做这做那。随着秋色一日深似一日，我们出发的一天比一天显得早，有时天边刚有曙色，我们就上山了，月亮挂上天幕，才返回村中。

上山的路多两三尺宽，除了拾级而上的台阶，就是沙石路面。老乡们最怕下雪，一下雪，就进不去山了，因为山道太窄，如果走急了，脚底会打滑。老乡告诫我们上山步子要慢：“快是慢，慢是快，高山怕枯干。”进山20里内，已经没有什么柴可砍，早让村民一年又一年砍秃了。就是新长起来的灌木，太细，不值得，村民们多让它们长着。往深处走，才能看到越来越密、粗细相当的灌木。到了可砍柴的地方，一群村里

人就分散开来，找自己有利的地形砍起来。当然，尽量砍已经枯死的柴，实在没有了再砍长成的灌木。

我们村的入担柴，是把长两丈左右的两捆柴上细下粗在顶部打成一个交叉十字，用一根较粗的棍子削得光一点横在两捆柴中间，分别捆实，两捆中间的这根棍就充当上肩的担子。下山时，横棍扁担，两手扶着两边的柴捆；这边肩膀累了，一扭，就换成了那边肩膀。最初，我们不会砍柴，二不会捆扎，三不会肩担，村里大人小孩都教我们。第一次进山，因为肩膀吃不住力，一路走一路拐，回来时，我们每人连抱带提，身上的柴也就二三十斤。后来，我们能和村里人一样砍柴、肩担，每次下来一称，女生能担八九十斤，男生能肩担一百多斤。有一次，下山惯性的疾走，使我的球鞋打滑，摔了一跤，一担柴脱手滚出，栽进了深不见底的沟里，幸好后面的男生拉了我一把，人才没有一块滚下去。每次担柴要走上二三十里山下，回